



# 殷商的上帝信仰与“帝”字形新解\*

郭 静 云

(中山大学历史系 中正大学历史系)

## 一. 前人对“帝”字的字形解释及其矛盾

《说文·上部》曰:帝,从上,束声。古文诸上字皆从一,篆文皆从二。二,古文上字。

然而,学者们却发现从“上”的“𡗗”字形,实源自甲骨文、金文中的“上帝”二字合文。因此,“帝”的原初字形并不从“上”,而写作“𡗗”。许慎的说法显然无法解释“帝”字的原始构造。

事实上,在未悉甲骨文之前,南宋郑樵早已提出了第二种假设。他认为“帝”字的结构并非从“上”、“束”声,而是象形字。其于《六书略·象形·正生·艸木之形》中指出:

“帝,象华蒂之形”。

此说极富创见,也广受古文字专家的推崇。因“𡗗”字上部有三角形构造,清代吴大澂更据以推论“𡗗”是“帝”字的简写,其言:

周窻鼎作𡗗,聃敦作𡗗,敦狄钟作𡗗,皆之繁文,惟、二字最古最简。蒂落而成果,即草木之所由生,枝叶之所有发,生物之始。

己丑丁父癸鼎,诸侯不祖天子。此器独于祖父上加“𡗗”字,其为“帝”字无疑如花之有蒂,果之所自出也。

王国维、王襄、郭沫若均从此说,且在观念上更明确地与女性生殖器发生连系。循此,乃逐渐发展成目前广为学界详悉、认同的“定论”。研究信仰、思想者,亦多采此“定论”,并据人类学的通论,将古人的宇宙观、天地万物的生成观等等加以理论化。

只不过,上述说法仍充满疑问。第一,从字形来看,我们很难将“𡗗”视作植物的象形,而且也没有

根据可以证明“𡗗”字的初文是三角形。第二,从甲骨文的用意来看,“帝”是天上崇高的信仰对象。目前尚未发现殷人崇拜神花的证据,更遑论信仰一朵犹如圣母生降万物的天上神圣花朵。第三,先秦的帝王均是男性,从“帝”后来成为先王尊称的字义发展脉络来看,既然未见有将帝王当作神花或圣母的例子,那么将“帝”字附会为花蒂或圣母,显然也失之牵强。

因为花蕊果蒂与“帝”字的用意毕竟难以相配,学者们乃另作推测,以花蕊代表仰韶文化的“帝”概念,只是到了殷商时代,“帝”字才隐没了原有的花蒂本义。无论仰韶文化是否有花蕊崇拜,殷商文化与仰韶或其它新石器文化之间,恐怕都没有那么直接的同等性,更不能以仰韶文化来解释甲骨文字的形成问题。

综言之,我们可以肯定在甲骨文出现时,“帝”字的本义应与花蒂无涉,故“花蒂说”根本不足采信。是故,许多学者对此抱持保留意见,认为“帝”字的象形意义迄今不明,或在论述中略过了字形的问题,纯粹讨论“帝”在卜辞中的涵义。

## 二. “帝”字形新解

以笔者浅见,郑樵将上帝视为花蕊,非常符合南宋人对大自然的理解和美感,应可代表南宋人的观点。但若以为殷商人的理解亦如此,则必须先证明殷人有崇拜花的倾向,且认为天上有一朵能够生杀万物的神花。可是无论在殷商甲骨文或礼器的纹饰上,都找不到与花有关的信仰痕迹,传世的神话记载中亦无此类说法。可知在殷商人的信仰中,上帝的形象应与花无关,故“帝”字不可能源于华蒂

\* 首届中国文字发展论坛暨纪念甲骨文发现 11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论文。

之形。

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笔者将透过“帝”字的实际涵义,以及借由自然科学的考察,对此字形来源提出新的假设。其论述如下。

#### (一)“帝”的身分与神能

关于“帝”在甲骨文中被表述的各种神能,学界已有充分论述,总其要点,约有几端。首先,“帝”无疑是天神,故谓之“上帝”。“上”在甲骨文中常指天,故“上帝”即为“天帝”<sup>①</sup>。至殷商晚期时,始用“帝”字作为王的谥号,但依然保留了原来的“天”义,这显示了“王”的概念在后世的演化及上升。

第二,据甲骨文可知,帝与祖妣为不同的崇拜对象。《合集》1402录有先王“宾于帝”的过程,足以证明先王并不被视为“帝子”。若训诂“宾”字的意思,《楚辞·天问》有言:“启棘宾商。”王逸注曰:“棘,陈也。宾,列也。”《逸周书·度邑》亦云:“下不宾在高祖,维天不嘉,于降来省。”朱佑曾校释:“宾,列也。”“宾于帝”乃指先王升天时能朝见上帝,并陈列于上帝左右,随之配享。《说文》曰:“宾,所敬也”<sup>②</sup>,可知“宾”字也带有敬拜的意思。关于帝、祖关系,宋镇豪先生分析如下:

夏商时帝与人王无血统关系,先王与帝所处不在一个层面,帝在天界最上层,先王处在中层天地间。《尚书·微子》即有云:“殷其弗或乱正四方,我祖底遂陈于上。”“陈于上”与“宾于帝”均有上下层位相异的涵义,这反映了殷人宗教信仰观念中的宇宙世界。西周以降王自命为上帝之子而称“天子”,人王位置上升,观念是有代变的<sup>③</sup>。

笔者认为宋先生的理解完全正确,其将“帝”归纳为自然崇拜,可毋庸置疑。

简言之,帝是指自然界中,居于极高天位的崇拜对象。其能够从天上赐命雨露<sup>④</sup>,也能降艰、降难<sup>⑤</sup>、降食(日食或月食)<sup>⑥</sup>、肇疾病<sup>⑦</sup>,或允诺建邑、王事成功<sup>⑧</sup>,在军事上授佑<sup>⑨</sup>,龙、凤等天上的气象神皆顺从帝的命令<sup>⑩</sup>。

#### (二)“上帝”的自然居处

由于帝所赐命的吉凶灾祥皆来自天上,故可推知帝常居于天。

《合集》14295云:

辛亥卜,内贞:帝于北方曰夬<sup>⑪</sup>,求<sup>⑫</sup>[年]。

辛亥卜,内贞:帝于南方曰熒<sup>⑬</sup>,凤曰夷,求年。

一月。

贞:帝于西方曰彝,凤曰夷,求年。

贞:帝于东方曰折,凤曰夷,求年。

此卜甲的内容在学界已有许多论述,其问卜目的在于祈求丰年,卜辞中则记载了四方风与四季的运行规律。对此,学者们的看法基本上一致<sup>⑭</sup>。

另外,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些卜辞推断:由于上帝能够派遣四凤管理四方风,故上帝应该位居天中。在商周信仰里,居于天中之帝被尊为天地之主、四时之本。如果在自然界里探求其位置,则天中必然相当于北辰。

自史前时代以来,所有的古代农耕文明都有观察星辰、并将之神格化的倾向。中国先民对恒星的崇拜亦属源远流长,自史前的文化信仰传衍而来,在许多流传至今的神话传说中,仍保留了公元前三千余年的天体状况<sup>⑮</sup>。有些人认为,古人无法了解星辰的移动规律,更没有计算北极位置的能力,故不可能有“天中”的概念。彷彿“天极”概念是生活在高科技社会里的现代人所独有的专利,这样的说法不仅过于低估古人的思考能力,同时也把基本的天文知识看得太复杂。

事实上,计算北极并不困难,也不需要高深的科技或复杂的仪器。在观察天象时,最容易发现的是,所有恒星皆围绕着同一定点运行。也就是说,所有恒星的移动路径都呈圆形,故而“天道曰圆”<sup>⑯</sup>。其中,又只有天圆的中央独一不动。是故,“天圆”和“天中”乃是中国先民自古即加以关注的自然现象,也是非常古老的崇拜对象和信仰重点<sup>⑰</sup>。

甲骨金文的记载向我们揭示了“天中”信仰与“上帝”崇拜,在殷商文化中是彼此结合的。商周的“帝”是独一无二的崇拜对象,上帝从不可企及的独特高位来管理一切上与下、中央与四方间的万有万象。其居于崇高天中,向四方派遣四凤(风)、降雨露、号令一切天象。在商周时期,帝是独一无二的崇高本体,其具有绝对独一的身份。当时尚未有五方“五帝”的概念,只有居于天地之中的绝高“帝”。康王时期的周公彝记载:

上下帝无终<sup>⑱</sup>。

这处记载揭示了“帝”不仅治理天上,且能完整地掌握天地间的一切,无所不及、无所不包,故可谓天地之主、天地之始、宇宙之中。

《史记·天官书》有言:

“中宫天极星 其一明者 太一常居也。”《索隐》案：“春秋合诚图云：‘紫微 大帝室 太一之精也。’”张守节《史记正义》：“太一 天帝之别名也。”<sup>②9</sup>

亦即，“帝”星是天上中宫唯一的一颗明星 在古人的信仰中，“太一”与“大帝”实为异名同义，二者皆用以指称天中北辰。

殷末之前，“帝”仅限于指称居于天中的主宰者。然而殷末时，“帝”字也开始被用作商王的谥称，以体现人王即天皇的理念。循此发展，在古代礼仪中也有仿效北极，强调圣人正南面而无为不动的概念。如《论语·卫灵公》曰：

子曰：“无为而治者 其舜也与？夫何为哉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”<sup>③0</sup>

这样的概念同样源自上古的北极天皇崇拜，天子正南面，所体现的正是天帝的状态。

### (三)据字义推论“帝”字的象形意义

从史料来看，假设殷人崇拜天中北辰，并视之为上帝，是完全可以解释得通，也不会产生矛盾的说法。据此申论，或许“帝”字的象形意义与其本义相同，都是指殷人观察所见的天中。为了了解“采”形的来源，此处有必要对古代的天文观测方式进行一些推理。

因地球运行产生的变化，从地面上观察到的两极（北极或南极）并非永恒的定点，而是处于极慢的旋转状态中，即所谓的“径动”（precession）。在北半球所观察的北极这一点（或在南半球所观察的南极），在天上运行一圈是25776年，因此目前所见的北极情况与殷商时期并不相同。仰赖现代天文学的技术，使我们得以推算殷商时期的天空概况。

殷商时，北极天中完全没有可见的星星，离北极最近的一颗星即“帝”星。在帝星两侧，约相等距离的位置上有太子星（左）和庶子星（右），这三颗星在天上排成一条直线，其中帝星最亮，庶子星最暗，都是人类肉眼可见的天体。其与北极的相对位置示意如下：

(太子星)(帝星)(庶子星)

● ● ●

○ (北极位置无星)

这三颗可以连成直线的星辰，围绕着空洞无星的北极点循转。

在北极另一侧有北斗柄上的天权、玉衡、开阳三星，与太子、帝、庶子三星相对而立，只是离北极稍远，且其间的相互距离也稍长。如果从帝星到玉衡星画一条直线，将发现北极的位置就在这条直线，若在太子与天权、庶子与开阳之间也各画一条直线，则三条线的交会处，恰好正落在北极点上。

除了这六颗星，在北极的左右另可见到两颗较小的星星：右枢星和少尉星。此外其他星体均太小太暗，若不借助天文仪器，单凭肉眼实难以察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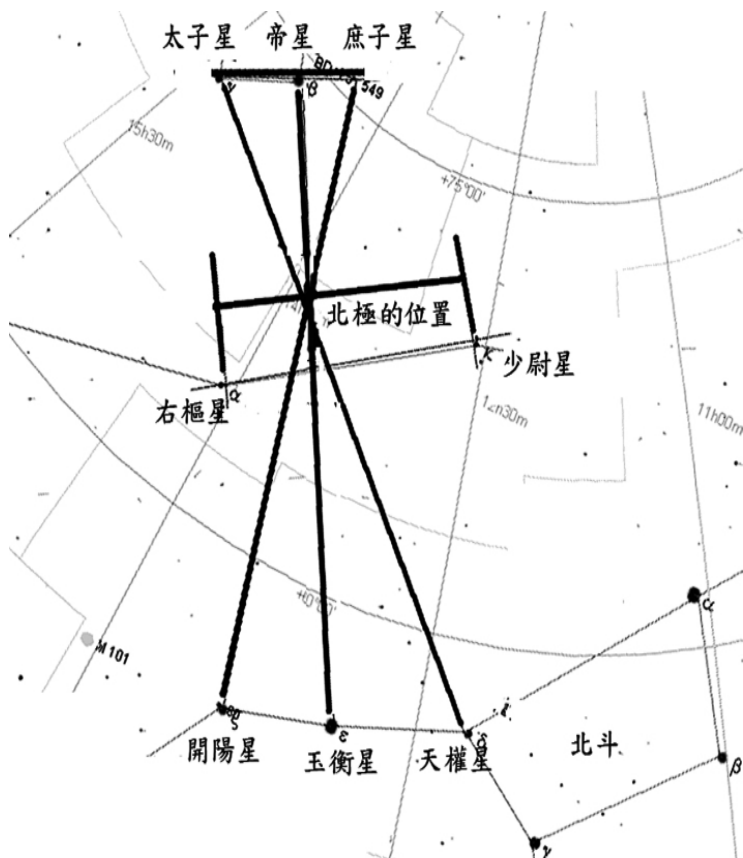
总结前述，殷商时期，人类所能观察到北极周遭情况大致应如下图：

(太子星)(帝星)(庶子星)

(右枢星) ● ● (少尉星)  
(北极位置无星)

(开阳星)(玉衡星)(天权星)

而具体推算出来的星象图则如下：







笔者曾请教几位天文学专家,他们一致认为,在殷商时期如果要正确标示出北极的位置,可用骨、竹、树枝等简单的

材料,制作一种“帝”字形的小仪器。太子、帝、庶子三星一线,可以用一横条作标示,在操作上也便于连接其它直线。再用三根较长的直条接在横条上,分别表示太子—天权、帝星—玉衡、庶子—开阳三条直线。因天权、玉衡、开阳的相对位置不完全是在一条直线上,这三星不宜连接,而必须在中央另外作一横条,用以固定仪器。假若以这具简易的“禾”形小仪器向天空对照,端点的横条可以连接太子、帝、庶子三星,中央的横条经右枢、少尉两星的校准后,可以使直条的另一端分别对应天权、玉衡、开阳,那么三根直条的交会之处显然就是北极天中的位置。这个观察法大略如下图所示:

因“帝”形的仪器只是几条竹竿或树枝,用后解散,所以难以考古发掘被发现。

由于当时北极附近只有这些可观测的星体,若想知道北极的位置,古人只能采用这种既容易又不失准确的基本方法来进行推断。

依据现代天文学的计算,可知这种借由连接六颗星以求得北极位置的方法,在公元前20世纪是最为准确的,往后误差渐大;不过直至15世纪,仍只有累积3度的落差,单凭肉眼实难以察觉,故此法也仍旧有其功效。

除了“禾”字形之外,卜辞中另有“𠂔”字形,用意相同,同样可以将其字形视为北极星图。冯时先生认为,“𠂔”(或“禾”)字的中间构型,是用来强调“中央”的意思<sup>⑩</sup>。此说亦值得参考,因为这个字的结构确实是应该用来强调崇高的“天中”位置。

若作进一步推论,殷商时期的“禾”乃指涉北极天中,与崇高的崇拜对象。同时,也可以指出在“禾”的结构里,最明亮、亦最近于北极的“帝星”。在整个“禾”的结构中,“帝星”虽离北极点最近,可是仍处于不停运转的状态。故卜辞中所言的“帝于北”<sup>⑪</sup>、“帝于东”<sup>⑫</sup>、“帝于南”<sup>⑬</sup>、“帝于西”<sup>⑭</sup>,即意指“帝星”运转的位置,也涉及了四时的运转。

### 三. 结 语

据上推论,殷商的“帝”应源自对北极的崇拜,而“帝”的字形也具体、充分地表达了其本义,不仅具体描绘了当时北极周围的天空概况,也保存了当时巫师推断北极位置的方法。本文的说法虽然仍属假设,但这个假设不仅符合商周人的信仰概况和当时重视天文观测的情境,从“帝”字的形构、用意来看,也和殷商时期的实际天文状态取得一致。

注释:

臧克和、王平:《说文解字新定》,第2~3页,中华书局,2002年。

郑樵:《六书略》,第8页,艺文印书馆,1976年。

(清)吴大澄:《字说》,第1、2页,学海出版社,1998年。

(清)吴大澄:《说文古籀补》,《石刻史料新编》第四辑·子书类,第237页,新文丰出版公司,2006年。

冯时先生近日亦针对此一问题进行过相关论述。参冯时:《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》,第67~71页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6年。

a.张荣明:《中国文化的帝与宇宙生成原型》,《天津师大学报》1997年第4期; b.姜广辉:《中国经学思想史》,第71~76页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3年。

刘翔:《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诠释学》,第11页,上海三联书店,1996年。

如姚孝遂言:“帝字究竟何所取象,仍然待考”。于省吾主编,姚孝遂按语编撰:《甲骨文字诂林》,第1086页,中华书局,1996年。

a.如陈梦家:《殷虚卜辞综述》,第562~572页,科学出版社,1956年; b.宋镇豪:《夏商社会生活史》,第758~762页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5年。

关于此一问题,请参郭静云:《甲骨文「下上若」祈祷占辞与天地相交观念》,《周易研究》2007第1期。

⑩ 冯时赞同陈梦家和夏渌先生言:「卜辞中广泛存在的「下上」或「上下」称谓,其意即指天地,而卜辞「上帝」的本义也就是天地。」冯时:《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》,第67页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6年。

⑪ a.台静农:《楚辞天问新笺》,第52页,艺文印书馆,1972年; b.黄怀信、张懋镕、田旭东撰:《逸周书汇校集注》,第477~478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年; c.(汉)许慎著、(清)段玉裁注:《说文解字注》,第281页,艺文印书馆,1966年。

⑫ 宋镇豪:《夏商社会生活史》,第762页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5年。

⑬ 如《合集》900、5658、10976、12852、14129、14132~14154、14160、14295等常见的卜辞。

⑭ 如《合集》10167~10175等。

⑩ 如《合集》21073。

⑪ 如《合集》14222。此外,另有「方帝」一词,如《合集》456等。这个词可能有较特殊的意义,锺柏生先生视之为祭祀的一种,而非指上帝。对此,本文姑且搁置不论。

⑫ 如《合集》94、6497、6498、7075、7407、14193-14207、24978、26090等常见的卜辞。

⑬ 如《合集》6270-6273、6473、6474、6542、6543、6664、6736、6737、7440、14190、14191、14671、21073等常见的卜辞。

⑭ 如《合集》14127、14128、14130、672、14225、14226、14195、34150等。

⑮ 「风」字有些学者直接通假作「凤」,但笔者认为,该字代表凤鸟为风神的信仰,故保留原字。

⑯ 对甲骨文「𠩺」字的看法不一。笔者赞同将此字释为「求」,而甲骨文「𠩺」(奏)字释从「求」、「収」会意兼形声字的结构。

⑰ 卜辞用「𠩺」字,即「微」与「嫩」的本字。但「微」系地名,而「嫩」则指涉吉祥之义,故此处读为「嫩」。参见郭静云《论“𠩺”、“𠩺”、“微”、“嫩”、“美”字的关系》,黄德宽、张光裕主编:《中国古文字论稿》,第391~396页,安徽大学出版社,2008年。

⑱ a. 胡厚宣:《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》,《复旦学报》1956年第1期; b. 杨树达:《甲骨文中四方风名与神名》,《积微居甲文说》,中国科学院出版社,1954年; c. 陈梦家:《殷虚卜辞综述》,第241、589页,科学出版社,1956年; d. 冯时:《中国天文考古学》,第167~186页,社会科学

文献出版社,2001年; e. 魏慈德:《中国古代风神崇拜》,台湾古籍出版,2002年; f. 李学勤:《申论四方风名卜甲》,《中国古代文明研究》,第28~32页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5年; g. 宋镇豪:《夏商社会生活史》,第798~806页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5年。

⑲ 例如牵牛织女的相对位置是从公元前二十八世纪才开始隔离,这在学界早有论述。其它尚有不少类似的例子,此处暂不赘述。

⑳ 参见《大戴礼记·曾子天圆》。高明:《大戴礼记今注今译》,第216页,商务印书馆,1984年。

㉑ 不仅是中国先民,其他的古文明对北极天中也都有所认识,并有崇拜天中的倾向。可是将北辰视为崇高上帝,应属中国文明的特殊之处。

㉒ 《集成》器号4241。

㉓ (汉)司马迁撰、(日)泷川龟太郎会注考证:《史记会注考证》,卷二十七,页三、四,第457页,大安出版社,1998年。

㉔ (魏)何晏等注、(宋)邢昺疏:《论语注疏》,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346页,新文丰出版公司,2001年。

㉕ 冯时:《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》,第25~37、71页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6年。

㉖ 如《合集》14332等。

㉗ 如《合集》14313、21084等。

㉘ 如《合集》14323等。

㉙ 如《合集》10976、13425、14328、21089等。

(特约责编:徐义华)

(上接第72页)

源》,第172~183页,中华书局2006年。

① 武汉市博物馆:《武昌东湖三官殿梁墓清理简报》,《江汉考古》1991年第2期。

② 杨泓:《雷公怒引连鼓辨》,第251~253页,杨泓、孙机著:《寻常的精致》,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。

③ 杨泓先生文章中所引“连鼓雷神”图像左右反转,本是面向右侧的雷神成了面向左侧,或许是制版过程中的疏忽。郭沫若在《甲骨文字研究·释干支》一文中指出,申字“反书者甚少”,见《郭沫若全集》考古编第一卷,第213页,科学出版社,1982年。验诸甲骨及金文,此说可信。

④ 《诗经·小雅·车攻》曰:“吉日庚午,既差我马。”将地支中的“午”与“马”相联系,这是此前十二生肖见于周代的最早证据。

⑤ 徐兆仁:《释凿》,《古文字研究》第十七辑,第223~229页,中华书局,1989年。

⑥ 姚孝遂主编:《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》第五册,第311页,中华书局,1988年。

⑦ 朱锡禄编著:《武氏祠汉画像石》,山东美术出版社

1986年。该书第116页将虹解释为龙门,不确,说见杨潜斋:《释“虹”“昌母”》,《华中师范学院学报》1983年第1期。

⑧ 转引自周世荣:《马王堆汉墓的“神祇图”帛画》,《考古》1990年第10期。

⑨ 容庚先生认为:“云纹是中国图案中的一大类别,又是我国民族形式的一个特征”,“雷纹是从圆形的云纹变成一种有方角的形式”。说见容庚、张维持:《殷周青铜器通论》,第104~105页,文物出版社,1984年。

⑩ 鸟居龙藏:《苗族调查报告》(国立编译馆译),第269~271页,商务印书馆,1935年。转引自罗正副:《无文字民族文化遗产初探——以贵州省扁担山布依族文化社区为例》,贵州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专业2005年硕士论文。

⑪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:《殷墟妇好墓》,第154~155页,文物出版社,1980年。

⑫ 孙秉君、蔡庆良合著:《芮国金玉选粹——陕西韩城春秋宝藏》,第74~75页,三秦出版社,2007年。

⑬ 江西省考古研究所、江西省博物馆、新干县博物馆:《新干商代大墓》,第158~159页,文物出版社,1997年。

(特约责编:徐义华)

语是地位较低的神灵。由此推论，𠩺意为“被使就座”，其前的成分也是受事主语，而受事主语是地位较高的神灵。

古文字考释方法已经十分成熟，孙诒让、罗振玉、唐兰、于省吾等前辈都做过精彩的总结。将文字置于文中推求其义的文字考释方法，许多先生已经提出并用于实践，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方法。但是，这种方法原来只是作为音、形、义三要素中字义一项的扩充，没有作为一种独立的方法。而面对那些无前承和后继关系的文字，用传统的音、形、义推考的方法，无法找到演变规律，很难考释。如何充分发掘和利用这部分甲骨文字本身所带有的信息，就成为文字考释必须解决的问题。高嶋谦一提出利用文字语境考释，不仅考虑了本字的上下文关系，而且利用不同字之间的横向对比，由相类的资料推勘一字的字义，扩大了文字考释的视野。

甲骨文字考释面临方法上的瓶颈，加强方法创新是值得探索的课题。本文是文字考释新方法的探索，对于日后的文字考释很有意义。但适用范围和具体操作程序还需要学者们在考释文字实践中验证。

## 二. 郭静云：《殷商的上帝信仰与“帝”字字形新解》

甲骨文中的“帝”不仅涉及商代神灵信仰，而且涉及天命上帝等哲学命题，一直是学界十分感兴趣的问题。关于“帝”字的考释也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从天文学方面解释商周时期的信仰，是近年来西方学者常用到的方法，如艾兰等即曾经从天文星象解释“帝”字，郭静云的文章则更加形象地为甲骨文“帝”字提出了新解。

郭静云《殷商的上帝信仰与“帝”字字形新解》一文认为商周时期“帝”是指自然界中，居于极高天位的崇拜对象，位居天中。如果从当前的天象看，自然界的天中必然相当于北辰。殷商时，北极天中没有可见的星星，离北极最近的一颗星即“帝”星。在帝星两侧，约相等距离的位置上有太子星（左）和庶子星（右），在北极另一侧有北斗柄上的天权、玉衡、开阳三星。如果从帝星到玉衡星、太子与天权、庶子与开阳之间也各画一条直线，则三条线的交会处，恰好正落在北极点上。在北极的左右有两颗较小的星星：右枢星和少尉星，将这两颗星连线，则与上述星星的连线构成帝字形。在殷商时期如果要正确标示出北极的位置，可用骨、竹、树枝等简单的材料，制作一种“帝”字形的仪器，用以观察北极的仪器，这是一种既容易又不失准确的基本方法。由此推论，甲骨文中的“帝”字即由此而来。

就这种天相形状看，由此释“帝”字有相当的可信性，但同其他用天象解释甲骨文的考证文章一样，缺陷都在于缺乏其他资料的支持，导致可信性难以确定。

甲骨文字是一种成熟的文字，文字的形成和演变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。帝是最重要的神灵，“帝”字的出现应当也很早，即甲骨文中的“帝”字已经经过长期的擅变，已经距离其原义较远。文献称“帝立子生商”（《诗经·商颂·长发》），甲骨卜辞中帝则是命令和控制诸神的至上神，帝已经完全是一种人格化的神灵，而非某种具体的事物，即“帝”已经远离帝字的本义。所以，由甲骨文出发探求造字的本义，已经很难。

虽然，“帝”字内涵已经超越了其本源，但探求“帝”字的本义，对于认识需要解决“帝”的人格化问题以及商周时期的宗教信仰，乃至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的天命观念等都具有重要意义。

## 三. 方辉：《说“雷”及雷神》

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，文字来自于现实中的事物，用实物解读文字是有效的方法。方辉《说“雷”及雷神》一文可谓以物解字的代表作。

甲骨文中的𠩺（申）字，先前的学者大多都认为是闪电的形状，并以此为基础考释相关文字。方辉：《说“雷”及雷神》认为所谓“𠩺”（申），为雷公的侧视形象，由此推论甲骨文、金文中的“雷”字乃像雷公击鼓之形。雷公的原型为猴，而猴与申字相联。作者利用大量考古实物与文献资料相结合进行了缕析，将申、雷（公）、猴之间的联系，从商代卜辞到秦汉典籍、图像，一一罗列出来，做出了可信的分析和推论。

在古代文献中，雷神的形象变化较多，鸟、猪、熊、龙等都曾作为雷神形象出现。但雷公为猴形的记载很多，民间流传也很广，《酉阳杂俎》描述雷神“忽骤风雨，有物堕如獾，两目眈眈。”《客中间集》也说“霹雳之中，亦有物焉，其形如猴而小，尖嘴肉翅，雷收声后，亦入蛰。山行之人，往往多于土穴中得之，谓之雷公”所以，将申、雷公与猴联系在一起十分可信。

雷神在历史早期的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，虽然随着宗教信仰和神灵系统的发展，雷神地位逐渐下降，但商周时期雷神地位依然十分重要。商周时期大量云雷纹，大家虽然相信其中含有宗教方面的意义，但都提不出具体的解释。如果方氏的结论成立，那么对于认识商周信仰将产生积极的影响。

（王宇信）